

“‘城市与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黄翔 王建文

(上海博物馆 上海 200003)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发展聚焦和折射着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文明化进程和国家起源的重要标志,并最终铸就了当今现代化城市的格局。为了展示上海地区的考古发现,反映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2014年6月6日-8月31日,上海博物馆举办了“申城寻踪——上海考古大展”。为配合本次展览主题,同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学术活动之一,上海博物馆于2014年8月22-23日召开了“‘城市与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应邀出席者有张忠培、严文明、李伯谦等60余位专家学者,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等博物院(馆)、北京大学等高校、各省市考古研究所以及日本和歌山大学等30多家研究单位。

本次会议收到论文50余篇,近50名学者作了演讲。会议主要围绕“中国早期文明、国家起源与都邑结构社会的形成”和“中国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与城市文明”两个主题,对不同时空范围的城市发展和城市文明进行跨区域的讨论。会议在简短的开幕式后,按照主题分为两组进行分组交流讨论。

第一组讨论主要聚焦于早期文明、国家起源理论的探索、最新考古成果交流和各地区个案研究等方面。

在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王妙发先生在《都市与文明定义小议》的发言中讨论了都市与城市的概念,提出用都市代替城市作为对早期城址的描述。陈淳先生以《聚落考古与城市起源研究》为题,从聚落形态研究及城市与都市化两个方面介绍了当今国际学界研究的视野和成果;结合中国

案例的探讨,指出聚落考古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物质文化和历史遗迹来分析社会结构及其发展的方法,这一方法可追寻社会复杂化以及城市和国家起源的具体轨迹,为聚落形态和城市起源研究提供一个世界性的参照。谢维扬先生在《国家起源研究中历史性事实对考古学证据意义形成的影响》中认为,国家起源研究应重视个案的完整研究,尤其是对个案中国家形成和发展情况长时段的历史性事实的关注;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应重视国家起源研究中历史性事实对于考古学证据意义形成的作用。杨建华女士通过《两河流域城市革命的发展历程》一文,从全球的视野,详细地探讨了西亚两河流域城市革命的发展历程,用考古资料重构了两河流域城市形成经历的功能分化、地位分化和全面整合的三个阶段,这一论述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赵春青先生在《中国史前城址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对城址与聚落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从宏观视角分别探讨了中国史前城址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具体分析了研究现状及目前存在的问题。部分学者则就长江流域、成都平原、中原地区、东北地区及山东半岛史前聚落、城址的变迁与兴起进行了深入探讨。刘斌先生的《良渚古城的筑城理念及方式》的发言详细介绍了近年来良渚古城遗址最新的考古发现,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良渚古城的选址特征、良渚古城的格局与历史变迁,并从环境的变迁、文化面貌的变化及洪灾的迹象探讨了良渚古城的衰落。魏坚先生通过《庙子沟原始聚落文明再探》一文,介绍了庙子沟遗址的布局和组织结构及其反应的社会关系、经济形态,认为可能是饥荒和瘟疫造

收稿日期 2014-10-12

作者简介 黄翔(1981-),男,上海博物馆考古部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新石器时代考古。

王建文(1982-),男,上海博物馆考古部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新石器时代考古。

成了遗址的废弃。孙波先生在《城子崖：早期城址与早期政体》的发言中认为，近年来城子崖遗址最新的发现，表明了龙山文化时期围绕城子崖建立的地区政体已经形成，并成为鲁北山前地带东西经济社会轴心上的重要一环；至岳石文化阶段，社会环境等因素促进了城子崖地区政体的完善。何锃宇、左志强先生分别撰文《试论成都平原龙山时代的城址》、《略论成都平原史前城址变迁与兴起问题》，讨论了成都史前城址类型的发展演变，在年代分析基础上梳理了城址与相关聚落的时空关系，并以宝墩文化为例，归纳了古城变迁的特点，探讨了成都平原史前城址兴起的背景。徐良高先生的《宗庙与祭祀：夏商周都城的突出特征》，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夏商周时期都城遗址内的重要遗存性质和聚落布局的研究分析，指出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的都城特征表现为以宗庙为中心，既是宗教祭祀中心，也是政治活动中心，政治活动与祭祀活动在此紧密相关。陈显丹、雷雨先生的《三星堆文明与三星堆古城》、《三星堆都邑考古新突破》介绍了近年在三星堆古城发掘中发现的城墙及大型建筑基址的情况，并以此探讨了三星堆古城的布局。

学者们还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早期城市的形成。高蒙河先生《长江流域史前城址分析》的发言，对长江流域城址的营建模式及地理分布进行了讨论，认为长江中游是中国史前古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但其在文明化进程中盛极而衰，导致城市发展史出现缺环，形成中国史前古城“北兴南衰”的历史现象。方向明先生以《分化中的凝聚：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形态和结构的变迁》为题，指出环太湖流域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和结构，是从早先零散单一的分布发展到密集区域化的遗址群，是分化中的凝聚；这种凝聚依靠着统一共同信仰，这种聚落模式具有相当的独特性，揭示了这一时期的聚落形态和结构，对中国早期文明的特征以及都邑结构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裴安平先生通过《聚落群聚形态视野下的中国城址与城市起源》，从史前城址城里城外居民组织属性的角度考察城市的起源，试图解决城市人口来源的问题，并以此探讨城市起源问题。他结合现有的城址材料，将中国城址、都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城址是军事中心，年代大约是距今5000年以前；第二阶段的城址是军事与政治中心，年代大约是距今5000年至夏、商、西周时期；第三阶段的城址已成为了军事、政治、经济中心，

年代是春秋时期以后。

在史前文明研究部分，学者们对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古国、良渚社会的权力结构、龙山文化时期鲁东南沿海地区的聚落结构和人口、环太湖流域早期社会意识形态、广富林文化与中原文明的互动以及从居址、玉器、陶器手工业角度探讨史前文明的起源和社会组织等议题进行了富有新意的阐释。宋建先生在《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古国：凌家滩和福泉山》中，探讨了文明进程与社会复杂化，古国与酋邦概念的相互关系，并探讨了凌家滩墓地所反映的凌家滩古国的社会分化现象，福泉山墓地所反映的福泉山古国社会演进的过程。陈杰先生的《良渚社会的权力结构》，依据良渚文化权贵墓葬的情况，将良渚文化的权力结构分为三个等级，认为最高权力来自于军权，神权是其维护权力的重要象征；良渚遗址群作为政治中心，对外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经济上的生产垄断和意识形态上的宗教传播；良渚社会存在明显的不平等的权力级差，但缺乏强有力的维持权力的手段。栾丰实先生的《鲁东南沿海地区龙山时期的聚落结构和人口》，对鲁东南沿海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结构进行了阐述，认为该地区存在着以两城镇为中心的北区和以尧王城为中心的南区，聚落的内部结构均为大、中、小三级。作为区域中心的大型聚落，采用直接管理周边中小型聚落和通过二级中心聚落管控外围地区的同时期聚落的手段实现对全部区域的有效控制，各自在相对独立的管辖区内形成了“都、邑、聚”模式的早期国家。张童心、王斌先生的《环太湖流域早期社会意识形态初探》，从马家浜文化墓葬所反映的埋葬观念、陶塑器物与意识信仰、雕刻制品与美学观念的角度，探讨了环太湖地区早期社会的意识形态。朱乃诚先生在《试探广富林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中的作用——从玉石琮谈起》中，将广富林遗址近年出土的玉石琮与太湖地区及中原地区发现的玉琮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了广富林文化对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及其在中原文明形成中的作用。杨晶女士在《多元、互动、交汇：玉文化视野下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早期文明》中，梳理了东北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玉器发生、发展的脉络，指出这两大玉文化系统虽各有渊源、各具特色，但在发展的道路上有着非常相似的阶段性，折射出南北两地在社会组织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相近的研究轨迹，从而探寻玉文化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王芬女士以《环太湖

地区居址视角下的社会结构分析》为题,从马家浜、崧泽、良渚、广富林文化的居址材料入手,结合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讨论不同时期社会组织、社会分化等的变迁过程,进而探讨聚落变迁的特征和动因。和奇、周广明先生利用陶器手工业专门化的相关理论,在《城市文明视野下的陶器手工业》中探讨了江西新干牛城陶器工业状况,指出普通的日用陶器区域特征突出,为自给自足;而高等级的器物则表现为远距离的、直接的器物流通。方燕明先生在《对夏文化探索的一些思考》中,就夏文化探索的过程、已取得的成果和尚存问题进行了介绍和论述,并阐释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文明探源工程中夏文化所给与的启示及思考。

第二组讨论主要聚焦于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城市考古成果及相关专题的研究。

历史时期城址调查与研究方面,近几年也有重要的收获。张敏先生的《鸠兹新证》,通过分析安徽芜湖鸠兹城的地理环境、“鸠兹”的义解与音训以及城与汤家山西周墓的联系,论证了该城可能是吴国都城。他认为吴国是一个野蛮而落后的军事独裁政权的国家,吴国都城即类似战争指挥中心的城堡,掠夺性战争成为吴国国家构成的第一要素。陈元甫先生依据近年的调查钻探成果,撰文《湖州下菰城的初步勘查与探索》,确认了湖州下菰城为一座商代城址。他在发言中指出,从整个太湖南岸的浙北地区来看,马桥文化时期的遗址不仅分布密集,而且很多遗址等级高,是马桥文化时期遗址的中心分布区域;而下菰城既是区内唯一的一座城址,也是太湖南岸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座商代城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魏存成先生的《高句丽的山城与王城》指出,高句丽的城址绝大部分是山城,城墙多为石筑,城墙与城内建有多种防御设施;文献记载高句丽以平壤为都的前段王城的特点是山城与平原城相结合,而到了以平壤为都的后段王城,则吸取北魏都城洛阳城的影响而发生了改变,反映了高句丽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融合。林留根先生通过《沉没的泗州城》,介绍了近年考古新发现的位于江苏省盱眙县西北部淮河北岸狭长滩地上的泗州城遗址,证实了三百多年前沉没于洪泽湖中的泗州城的存在。他介绍说,泗州城有隋大运河的一段——汴河流经其中,随着大运河的通航而逐渐兴起,在唐宋两朝盛极一时,至元明时期逐渐衰落,终于在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被洪水淹没,之后沉没于泥沙之中。何继英女士的《唐代青

龙镇的功用》,介绍了上海青龙镇遗址的考古发现、地面古建筑和史料记载等,认为唐代青龙镇主要有四个功能,即海防要地、佛教胜地、贸易港口、手工业铸造场所。杭侃先生撰文《土司城与抗蒙山城体系》,介绍了即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湖南湘西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贵州遵义海龙囤三座土司城,进而论证了四川抗蒙山城的布防体系,认为它在筑城理念上与土司城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历史时期的城址一般规模较大,数量较多,部分城址的考古发掘延续了很多年,如鲁故城、长安城、扬州城等,学者们结合多年来的发掘材料,对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材料与方法上,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夏连保先生的《关于商周时期蓟城的几个问题》,认为“蓟”是商代就已存在的一个地名,可能源于商代的部族或方国,其地理位置就在今天的北京一带;今河北省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北的台地上有一座古城遗址,很可能就是黄帝部族在黄帝之后自涿鹿之邑迁入北京腹地之遗民,成为北京最原始的聚落。赵化成先生在《关于东周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中认为,东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承前启后的大发展阶段,以列国都城为代表,大型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形态的变化等,无不对后世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周列国都城两城制是战国时期才普遍出现的,是君主权力强化的一种表现。曹竣女士撰文《先秦吴越城址试析》,全面收集了吴越地区先秦时期的城址材料,对城址的地理位置、分布特点、形制结构、规模大小、筑城技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先秦吴越城址在东周时代大背景下,其发展既与中原列国城市具有共同的特点,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区域特征。刘延常先生《曲阜鲁国故城与文化遗产》介绍的鲁国故城新发现的东周时期宫城与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是周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他指出,历年的考古发现证明,鲁国都城具有先进的城建理念,因其保存典章礼制丰富而成为周文化在东方的代表,对后代城市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张建锋先生通过《论城市水利与城市文明:以西汉都城长安为例》介绍的汉长城的城市水利设施,主要是供水设施和排水设施,还有部分蓄水设施。他认为水资源及水利系统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前提条件,同时也是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障。楼建龙先生的《福州古代的山水环境与城市形成》,指出历年来福州城市考古发掘的成果,反映了福

州这一座享有“城在山中、山在城中”、“城在水中、水在城中”、“环流有致、潮汐相通”的河口盆地城市的格局例证,以及福州的城市形成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汪勃先生通过《扬州城的沿革发展及其城市化》,详细介绍了扬州城的沿革发展——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修筑的邗城一直到清代的扬州城,历数了各个时期城市的发展特点,认为邗城、广陵城、江都城、扬州城等名称对应着扬州城的始建、扩建、发展、形成等历史阶段,揭示了这座历史名城的发展路径。

专题研究方面,李小萍女士的《从南宋金银货币看京城临安的繁荣》是从货币史的角度探讨南宋都城的繁荣,她介绍了多年来南宋金银货币的出土概况,分析了历史文献记录的民间用银情况,认为南宋金银货币已经广泛应用于各项专卖、各种赋税以及政府规定的年度上供等国家财政收入和民间生活,而众多的金银交引铺和大量金银出现在京城,显现了南宋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庶。其余学者的发言主要是关于上海本地考古发现的专题研究。叶倩女士的《青龙镇遗址出土唐代瓷器的相关探讨》,从出土的青釉褐彩贴花执壶、青釉褐绿彩变形莲花纹碗、擂钵、酱釉腰鼓等唐代瓷器入手,探讨了其来源、产地、纹饰和用途等问题,并结合文献和其他实物遗存概述了唐代青龙镇在东西航运、南北漕运中的重要地位和瓷器运输、交换中的巨大作用。徐汝聪女士的《试论僧伽崇拜及其相关问题》,则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全国各地出土的僧伽造像,认为僧伽崇拜从唐代开始直到近代在佛教信仰和民间崇拜中一直存在并演变,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具体表现;而四川石刻造像与江浙沪地区佛塔出土的僧伽造像存在粉本相似的情况,则显示出两地区佛教传统的共通性和一致性。王建文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考古发现及传世画作,撰文《蒙元时期的南人氏族:以任仁发家族为例的考察》,将任仁发家族放在蒙元帝国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分别就出土墓志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任氏家族的谱系、墓葬形制与出土文物的墓主归属及功能进行了论述,最后结合传世画作对任氏家族在蒙元统治时期的出任途径进行了探讨,指出任仁发家族作为南人士族在族群等级制下的困境,同时也是整个南人士族群体的一个缩影。孙慰祖先生的《上海出土元明印章的印学思考》,探讨了上海考古工作中发现多例元、明文士阶层私印,认为它们与上海城镇文人群体的聚集与士大夫文化的流行相表里;圆应塔所出“仲文”石章及

朱氏父子墓出土的组印,则填补了元明私印断代标准品的短缺,也为重新认识中国文人篆刻的发育机制和复古印风的社会影响带来了新的资料条件,反映出世俗社会价值在宗教仪轨中的融入。翟杨先生撰文《上海地区出土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发言,根据金器铭文的书写格局与章法,牡丹花、执荷童子、瓜瓞纹的纹饰图案与制作工艺等方面,判断上海电视大学松江分校窖藏金器的制作年代应该为元代晚期。他认为,上海明墓出土的首饰大致以嘉靖朝为界分为早晚两段,明代首饰相较于宋元时期,流行镶玉嵌宝,器形更加精巧,对清代及现代首饰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8月23日下午举行全体会议,在两个分组的召集人裴安平与魏存成先生分别介绍了各组的交流情况后,李伯谦、严文明、张忠培三位先生分别作了重要的主题发言。

李伯谦先生认为,通过本次展览,大家对上海的考古工作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对上海的历史也有了新的认识;通过本次会议,大家了解了最新的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如良渚古城、三星堆、下菰城等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他结合个人最近几年的一些思考,指出传统考古学重视地层学、类型学,对于文化谱系传承的研究已经相当细致,但这些已经不能满足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所需。他以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例,认为依据物质文化研究得到的文化谱系传承关系,不能完全反映它们的社会发展道路,考古工作者应重视精神文化领域的研究。李伯谦先生还指出,考古学研究中需要加强对文献材料的重视。他认为,古代历史的研究有三个不同的侧面:其一是传说史学及文献史学,其二是考古学,其三是社会学,三者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在研究古代历史时应将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研究。虽然文献资料存在着错误、谬误,使用前应当先行甄别、去伪存真,但是若因此而忽略文献,对研究历史来说是存在着极大缺陷的。

严文明先生用三句话概括了城市与文明的关系。第一,城市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文明最集中的表现。城市的起源是聚落考古的一个重要课题,伴随着农业的产生,定居的生活方式出现,聚落逐渐形成。兴隆洼文化时期出现了由围壕及大量结构相似的房屋组成的凝聚式的聚落。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由围壕及若干组向心式房屋组成的聚落,不同组之间开始出现差别;随着这个差别的进一步发展,聚落内部和聚

落之间产生分化,至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现了中心聚落;中心聚落进一步发展就产生了城,城是聚落演变、生产发展的产物。而社会分化的基础在手工业,尤其是诸如玉器制造等高级手工业;高级手工业的原料、技术、产品被贵族阶层所掌握,同时贵族阶层又进一步想控制更多资源,应运而生的就是武器,用以进行掠夺;为了应对这种武装掠夺,城圈是当时最为简单有效的手段,至此,由城圈包围的城出现了。城内集中了当时最高的技术、最好的产品、最高的文化,是文明因素集中的表现。第二,城市的发展是文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文明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城市,城市发展水平代表了文明的发展水平。第三,城市形态是区分不同文明传统的重要标志,如同中国的城在形态上区别于欧洲的城、美洲的城那样,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产生了不同的城市形态。

张忠培先生认为,“‘城市与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一次成功的、高水平的会议;“上海考古大展”非常精彩,通过考古发现展现上海历史的发展脉络,令人印象深刻。他指出应通过对上海城市发展的研究,总结出一套具有规律性的认

识,进而推进上海的城市建设。张先生说,上海的历史从马家浜文化开始一直到清代,有六千多年,期间经历了两个发展高峰:从马家浜文化经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时期,是第一个发展高峰,特别是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时期,有很多原创性的发明,如陶器的轮制技术、石犁、石刀等,玉器的制作也处于非常高的水平,显示其已达到了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第二个发展高峰是近代开埠以来,上海通过引进与模仿,逐渐发展成为在整个东亚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城市,并促成了海派文化的形成。这说明,一座城市的繁荣发展,创新是其中的关键。

通过本次会议,学者们从跨区域比较的角度,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早期文明发展和城市考古成就进行比较研究,获得了关于中国城市与文明研究的新认识和新成果;在各类专题研究方面,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讨论,材料扎实,考据详实,展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本次会议围绕“城市与文明”的重要主题,在理论、方法、材料上都有新的收获。这次会议将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良好的开端,将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相关问题的讨论,解决学术上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责任编辑、校对:毛颖)

《〈东南文化〉200期目录索引》征订启事

《〈东南文化〉200期目录索引》收录了《东南文化》自创办至第200期(即《文博通讯》1975年第1期~《东南文化》2007年第6期)的全部篇目,按学科、研究领域及内容等分类,共分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民俗学、文物研究与鉴赏、建筑与园林、书刊评价与学术动态、知识介绍及其他、图版等十一部分;另附录有作者姓名索引与《东南文化》2008、2009年目录索引。《索引》内容全面、分类科学,是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及遗产研究与保护、文化史论、艺术史论、宗教文化、建筑文化等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以及考古文物爱好者检索、查阅的工具书。

本书装帧印刷精美大气,为大16开本,257页,订价68.00元。需要者可直接向编辑部订购。本刊在收到订单及书款后,即时邮发。

通信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321号

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杂志社

联系人:何刚

邮政编码:210016

电话:(025)84806201

E-mail:dnwh@chinajournal.net.cn